

主题研究:古代中日“书籍之路”

编者按: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历史悠久,而且形式独特,其历史渊源流长,从秦汉之交迄今至少已有两千余年,就形式而言,两国人员往来受大海阻碍,书籍成为授受文化的主要载体。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专事中日书籍交流史研究十余年,出版过《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》、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、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、《中国馆藏日本汉文书目》、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传日本之研究》等著作。近年来,该所所长王勇教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,提出了全新的“书籍之路(Book Road)概念,意欲突破“丝绸之路”的传统思路,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。“丝绸之路”横贯亚洲,作为物质文明的象征,在历史上促进了欧洲、亚洲和非洲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;“书籍之路”跨越大海,作为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,对古代东亚尤其是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王勇教授的这一学术创意,受到了国内外舆论及学界的密切关注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》等媒体纷纷予以专访或报道,中国教育部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、浙江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也都拨款资助此项课题研究。为了更好地传递前沿性的学术思想,交流中日文化研究的新理念,本刊特开辟“古代中日书籍之路”专栏,欢迎海内外学者共同参与探讨。

本期专栏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“古代中日书籍之路”课题组供稿,并特约该研究所所长、课题组负责人王勇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。

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

——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

王 勇

(浙江大学 日本文化研究所,浙江 杭州 310028)

[摘要]“丝绸之路”最初是西方人针对东西方贸易路线提出的术语,不能无节制地套用于世界其他区域间的文化交流。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(尤其是中日)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,可以发现,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、形式,还是在意义、影响等方面,均有别于“丝绸之路”,故应倡导“书籍之路”的概念。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,那么,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;一般而言,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,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们的心灵,并超越时空,惠及后代。日本的遣隋唐使均以购求书籍为重任,这便是中日两国虽然人员往来极少,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甚多之原因所在。

[关键词]中日关系史;东亚文化圈;遣唐使;东西文化交流

[中图分类号]G125 [文献标志码]A [文章编号]1008-942X(2003)05-0005-08

众所周知,“丝绸之路”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(1833—1905)首创,他在1877年出版的《中国》一书中,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。继李希霍芬之后,赫尔曼、斯坦因等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勘查,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,使之成为

[收稿日期]2003-04-13

[基金项目]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“十五”规划项目“古代中日书籍之路”(01JA770017)

[作者简介]王勇(1956-),男,浙江平湖人,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日本古代史、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。

世界上“最长、最古、最高”^①的东西交通路线。

19世纪末欧洲人倡导的这一艰深的专业术语,今天不仅已为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,甚至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词汇。进入20世纪中期,好事者不断扩大“丝绸之路”的概念,除了传统的“沙漠丝绸之路”,还认为存在着“草原丝绸之路”、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等等^②。

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赏,近年成为国际性热门话题^③。在中国,广州、泉州、宁波等地为了申报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世界文化遗产,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活动,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;在日本,古都奈良以“海上丝绸之路终点”自居,成立了“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纪念国际交流财团”、“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”,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。

笔者虽然多次参与筹划中日两国的相关学术活动,频繁往来于宁波与奈良之间,但疑窦也由此而生。尤其是多次观赏享誉“海上丝路博物馆”的日本正仓院之后,疑问逐渐变得明朗,遂产生一股倡导“书籍之路”的强烈愿望。

一、“海上丝路博物馆”探秘

2001年10月,第53届“正仓院展”在奈良开幕,翌日传出一个令人惊愕的信息:展品《成唯识论》第四卷的卷末,发现“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”墨书文字。其时,笔者正在当地主持“往返丝绸之路的遣隋使·遣唐使”国际会议,即与几位同行前去核实,初步确认纪年墨书与经文出自同一人之手。

《成唯识论》共10卷,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,从显庆4年(659)闰十月开译,同年十二月完成,其徒窥基(慈恩大师)担任笔受(记录)。“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”的墨书表明了第四卷译完的时间,按照一般程序,须再经润文、缮写等程序之后才上呈朝廷。

现藏正仓院的《成唯识论》卷第四,很可能是未经润文、缮写的窥基手稿,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。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,道照(一作“道昭”)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,回国时玄奘“以所持舍利、经论咸授和尚”,道照回国后创建禅院;“此院多有经论,书迹楷好,并不错误,皆和尚之所将来者。”^④由此看来,这部《成唯识论》大概是回国时玄奘所赠,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[1]。

正仓院被称为“海上丝路博物馆”,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。奈良时代(710—794)原是东大寺的校仓,日本天平胜宝8年(756)圣武上天皇去世,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度藏的“国家珍宝”600多件,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。这些皇室至宝多为遣隋唐使带回的唐代文物(包括西域文物),如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《杂集》,光明皇太后临书《乐毅论》、《杜家立成杂书要略》,王羲之、王献之书法真迹,王羲之书法摹本20卷等等(《东大寺献物账》)。

正仓院宝物品种繁多,含书籍、文具、礼器、佛具、玩具、服饰、食具、药物、武器等,虽然不乏丝绸制品(如服饰、佛具),但比起金银器、玻璃器、漆器等要逊色很多,而至宝中的至宝莫过于文献典籍。

正仓院究竟收藏多少文献典籍,笔者尚未做过精确统计,其数量当以万计。比如,度藏佛教书籍的“圣语藏”就有隋代写经22卷,唐代写经221卷,宋版114卷,总数达4960卷之多。前面提到

①“丝绸之路”在时间上持续数千年,在空间上绵延数千里,穿越有“世界屋脊”之称的帕米尔高原,所以堪称世界上“最长、最古、最高”的贸易通道。

②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过一套《丝路文化》丛书(1995),含《沙漠卷》、《草原卷》、《海上卷》、《吐蕃卷》、《西南卷》,即为一例。

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87年至1997年实施“丝绸之路考察”(Silk Road Expedition)十年规划,重点考察东西方海陆交通。

④《续日本纪》卷一“道照薨传”(700年)三月己未,道照和尚物化……初孝德天皇白雉4年(653)随使入唐,适遇玄奘三藏,师受业焉……于后随使归朝,临诀,三藏以所持舍利、经论咸授和尚,而曰:人能弘道,今以斯文附属。……登时船进还归本朝,于元兴寺东南隅别建禅院而住焉……后迁都平城也。和尚弟及弟子等奏闻,徙建禅院于新京,今平城右京禅院是也。此院多有经论,书迹楷好,并不错误,皆和上之所将来者也。按“楷好”疑“皆好”笔误。

的《成唯识论》卷第四,只是其中的一卷而已。

笔者前后6次参观“正仓院展”,匆匆浏览丝织品、陶瓷器、金银器后,总是伫立在书籍展台前陷入沉思:若论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巨大,对日本人心灵渗透之深远,究竟是色彩斑斓的丝绸残片,还是深奥难解的汉文典籍呢?

二、周作人的‘优孟衣冠’论

20世纪初(1906)周作人追随鲁迅留学日本,在东京住了6年后回国。30年代中期(1936),他在北平寓所写了一篇随笔,题目叫《日本的衣食住》(收入《日本管窥》、《苦竹杂记》等),回忆当初在日本的感受:“我们在日本的感觉,一半是异域,一半却是古昔,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,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,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。”[2] p.28所谓“古昔”,作者解释即“中国古俗”,文中还介绍“夏穗卿、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,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,常指点赞叹,谓犹存唐代遗风,非现今中国所有”,因此断言:“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,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。”

且不论周作人的比喻是否妥当,大凡中国人踏上日本国土,尤其是去古都奈良、京都观光,多少会产生似曾相识、回归往古的奇妙感觉。在日本急速西化^①的近代尚且如此,全盘模仿中国的古代则更不待言。

隋大业四年(608),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;“东至秦王国,其人同于华夏”(《隋书》倭国传),表明7世纪初日本部分地区已经“华化”了。五代义楚著《释氏六帖》,说“徐福将五百童男、五百童女”到日本;“今人物一如长安”。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,并由此化生出“慧思转世倭国王子”、“杨贵妃东渡日本”等等传说[3](pp.329-393)。

如果上述诸例说的是“海上丝路”的景观,那么,“沙漠丝路”又呈何种景状呢?兹引录唐代诗人王维的《渭城曲》(一作《送元二使安西》):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[4] pp.1306-1307^②这首脍炙人口的送别之作,堪称千古绝唱。友人元二将离咸阳(渭城),前往安西(唐安西都护府治所,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境);王维为之饯行,再三劝酒,依依不舍。诗眼即在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一句,因为出了“阳关”^③,再也碰不到“故人”,面对的将是文化习俗迥异的陌生世界,所以,读来便觉诗中涌动着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之气。

既然同为“丝绸之路”,东西两地的文明景观为何如此相异?一种解释认为:唐代日本频繁遣使来华,促成中国文化大量东传。其实,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。日本由于大海阻隔,唐代约300年间来华使团不过15批,平均20年才一次,相比之下,西域诸国与唐陆路相通,使团往来远较日本频繁。以大食为例,从651年至798年遣使39次,平均3年一次,有时一年数至[5] p.31)。

显然,文化的传播并非一定与人员往来的频率成正比,关键是看使团为何而来,携带什么而归。回头再看周作人的随笔,他说日本与中国相似;“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”。周作人巧用“优孟衣冠”的典故^④,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已超越了模仿皮毛的阶段,而将之化为血、化为肉、化为骨了,因而中国文化是“健全地活在异域的”。

运往西方的丝绸,大抵只能做成“衣冠”,或供权贵炫耀,或为女士增艳,虽然可以暂时装点门

① 这里的“一半异域”,当指明明治维新后西化的层面。

② 《全唐诗》卷一七八;“青青”一作“依依”;“杨柳春”一作“柳色新”。

③ 阳关因在玉门关之南得名,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,为古代通西域要道。

④ “优孟”是楚国优人,愤于宰相(孙叔敖)死后遗族未获厚遇,遂穿戴故人衣冠见楚王,历数孙叔敖功绩,楚王触景生情,下诏优待其家族。引申为逢场作戏、粉墨登场、生硬模仿等。

面,毕竟无法影响其心灵。那么,不属‘优孟衣冠’的日本,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呢?

三、日本遣使唐朝之目的

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,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,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频发生。贞观五年(631),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,唐太宗‘矜其道远,敕所司无令岁贡’,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〔6〕(p.5340)。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;‘自云路经地狱之门,亲见其上气色蓊郁,又闻呼叫锤锻之声,甚可畏惧也。’〔7〕(p.419上)

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,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,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。比如说鉴真大师5次东渡失败,途中死亡36人,280余人退出,最后仅24人抵达彼岸(《延历僧录》)。以此察之,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,必肩负着重大使命。

首先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与来自西域的使节不同,主要目的不在于购求丝绸。当西方人深信赛里斯人从树上采集羊毛编织丝绸时^①,日本人已学会‘蚕桑缉绩’,生产‘细、缣、绵’,甚至向中国出口倭锦、绛青缣、绵衣、帛布、异文杂锦等〔8〕(p.855 p.857 p.858)。

在唐代的中日史料中,我们没有找到遣唐使大量进口丝绸的记录,倒是发现遣唐使带来的贡品以丝绸为主,日本朝廷支付给使团成员的经费也全部是丝绸、布帛之类^②。既然遣唐使携带丝绸作为贡品和货币,他们远道而来意欲得到什么呢?其实《旧唐书》(日本国传)已经给出答案:

开元初,又遣使来朝,因请儒士授经。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,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,题云‘白龟元年调布’。人亦疑其伪。所得锡赉,尽市文籍,泛海而还。其偏使朝臣仲满,慕中国之风,因留不去,改姓名为朝衡,仕历左补阙、仪王友。衡留京师五十年,好书籍,放归乡,逗留不去。〔6〕(p.5341)

日本使以‘阔幅布’作为束修之礼,‘所得锡赉’‘尽市文籍’,其‘好书籍’如此。所谓‘锡赉’当指钱币,而非实物^③。假设《新唐书》列为‘西戎’的波斯、大食、拂菻等同年入朝,且也获锡赉的话,会不会‘尽市文籍’而去呢?相信不会。来自‘沙漠丝路’的使者,大概会满载丝绸西归。这就是东西使者之不同,他们从唐朝携归的物品,反映出各自的文明取向。

关于唐代中日关系,池田温教授概括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三个方面,指出“当时交易等经济关系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,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”〔9〕(p.13)。笔者以为,上述见解也适用于遣唐使之目的;‘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’则可置换为‘书籍’。

遣唐使源于遣隋使,两者在日本历史上首尾衔接,前后约400年。这期间,日本使团肩负的具体使命并非一成不变,但购求书籍一直是他们的主要任务,这从中日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佐证。如《善邻国宝记》(卷上)引《经籍后传记》^④(原文双行夹注,改为括号内单行注):

以小治田(今按推古天皇)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,始用历日。是时国家书籍未多,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,买求书籍,兼聘隋天子。〔10〕(p.34)

① 古代罗马、希腊的‘羊毛树’传说,参见[法]岱岱司编、耿诚译《希腊拉丁作家远古文献辑录》,中华书局1987年6月版。

② 《延喜式》(大藏省)载有贡献‘大唐皇’的礼单:‘银大五百两,水织纈、美浓纈各二百疋,细纈、黄纈各三百疋,黄丝五百鈞,细屯绵一千屯。别送綵帛二百疋,叠绵二百帖,屯绵二百屯,布三十端,望布一百端,木绵一百帖,出火水精十颗,玛瑙十颗,出火铁十具,海石榴油六斗,甘葛汁六斗,金漆四斗。’

③ 《旧唐书》(崔祐甫传):‘时李正己畏惧德宗威德,乃表献钱三十万贯。上欲纳其奏,虑正己未可诚信,以计逗留止之,未有其辞,延问宰相。祐甫对曰:‘正己奸诈,诚如圣虑。臣请因使往淄青,便令宣慰将士,因以正己所献钱锡赉诸军人,且使深荷圣德,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财货。’上悦从之,正己大惭,而心畏服焉。’是可为证。

④ 原书已经失传,逸文散见各书(除《善邻国宝记》外,还有《政书要略》等),书名或作《儒传》。

这是文献所载日本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求书使团^①，自此，中日之间的书籍流通渠道开通，并在遣唐使时代得到进一步拓展。遣唐使官员的求书情况，除前述《旧唐书》（倭国传）之外，据《日本书纪》记载，第二次遣唐使回国（654）后，大使吉士长丹因“多得文书宝物”而获封户、晋位、赐姓，可见求书成果甚至会影响仕途。

四、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渠道

稽考《新唐书》（列传）李唐治世约三百年间，遣使入唐通聘的国家五十有余。通观唐朝与北狄、西戎乃至南蛮的交聘内容，多为征战、和亲、贸易之类，唯独东夷别具一格，包含了书籍的流通。《通典》（东夷上）云：“大抵东夷文书并同华夏。”^[11]（p.4985）这是书籍交流给东亚诸国带来的文明盛况。

东亚诸国遣使入唐求书，这在来自其他地区的遣唐使中实属罕见。白居易在编定《白氏文集》时提到：“集有五本……其日本、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抄者，不在此记。”《旧唐书》（张荐传）盛称张鷟（文成）文章天下闻名：“新罗、日本东夷诸蕃，尤重其文，每遣使入朝，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。其才名远播如此。”^[6]（p.4024）由此可见，唐代著名文士的诗文虽云“远播海外”，其实主要在东亚文化圈内向东传播，这恰好印证书籍之路的存在。在贯通中日两国的书籍之路上，遣唐使（特别是使团中的留学僧俗）无疑扮演了主角，他们有国家提供的购书经费，又受到唐朝的优待，比较容易完成求书使命。

比如留学僧玄昉，一次携归佛教经论达五千余卷，约当唐代大藏经的总数^②；再如留学生吉备真备，归国时携带《唐礼》、《大衍历经》、《大衍历立成》、《乐书要略》等共计一百五十余卷，此外，号称“入唐八家”的最澄、空海、常晓、圆行、圆仁、惠运、圆珍、宗睿，曾在中国求得数以千计的经卷，所编《将来目录》传承至今^[12]（p.227）。

遣唐使虽然扮演着中国典籍传播的主角，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其他配角。尤其是进入9世纪后，中国、新罗乃至日本商人活跃于东海，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出现了多种渠道。兹举证如下：

（一）私人馈赠。翻检最澄、空海、圆仁、圆珍等入唐僧的传记，几乎都得到唐人馈赠的书籍。现存的一些佛教经疏的序跋，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。

如石山寺藏《遗教经》跋云：“唐清信弟子陈延昌，庄严此大乘经典，附日本国子监大学羽右满于彼流传。开元二十二年二月从京发记。”再如《肇论疏》（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本）卷上记云：“大唐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乙亥闰十一月三十日，扬州大都督府白塔玄湜，勤教流传日本国大乘大德法师，使人发促，无暇写，聊附草本，多不如法，幸恕之。后睿师、源师还，更附好本耳。”上述唐人陈延昌、唐僧玄湜在遣唐使回国之际，为使佛教流传日本，均曾抄写经疏相赠。

（二）渡日唐人随身携带。唐人渡日人数不多，但影响颇大。以鉴真一行为例，随身携带佛教书籍数百卷，其中的天台章疏成为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的契机。天平7年（735）渡日的袁晋卿，因通《文选》、《尔雅》，被任命为大学寮音博士，大概也带去相关书籍。

在唐代的中日书籍交流中，还值得一提的是渡日唐人在日本撰写的书籍。随鉴真赴日的法进，主持东大寺戒坛院，著有《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》、《东大寺受戒方轨》、《沙弥经钞》、《注梵网经》等；随鉴真移住唐招提寺的思托，撰有《延历僧录》和《大唐传戒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》，前者是日本僧史之滥觞，后者成为淡海三船著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的蓝本。

（三）中国商船的载运。9世纪以后，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，他们的船载品中就包含了

① 推古十二年为西历604年，小野妹子（汉名“苏因高”）使隋在607年。

② 唐代编撰的《开元藏》（即《开元释教录》）共5048卷。

书籍。如据《文德实录》记载,承和5年(838)藤原岳守在太宰府检校唐船货物,偶得“元白诗笔”^①,进献给天皇,因获升官晋级。元庆5年(881)抵日的唐商张蒙,临行前受李达之托,将日本所缺的佛书一百二十余卷载往日本,转送给曾经入唐求法的圆珍。李达本人也是一位商人,齐衡3年(856)与圆珍同船去过日本。

(四)新罗人和渤海人的传播。在遣唐使时代,中日直通的书籍之路虽然畅通,但中介新罗、渤海的间接渠道仍然发挥着作用。仅以渤海为例,天安2年(858),渤海使乌孝慎赴日,带去唐朝的新历本《宣明历》,日本朝廷奉若至宝,因废已经过时的《大衍历》和《五纪历》(均为唐历),施行渤海使传来的《宣明历》,这部唐历此后沿用约八百年,其影响不可低估^[13]。

有唐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?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,但日本贞观17年(875)编撰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,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。该目录辑入书目1579部计17345卷,约当《隋书·经籍志》(36708卷)的一半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(51852卷)的三分之一强。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皇室图书馆(冷然院)化为灰烬之后编撰的残存书目,那么,其数量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。

五、“书籍之路”的文明涵义

“沙漠,驼队,西方,夕阳西下,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,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;大海,船队,东方,旭日东升,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,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。”笔者曾经如此描述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的不同景观^[14]。但是,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,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。

古代输往西域的丝绸,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,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,然而,当年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,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。这些书籍犹如文明的种子,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,继而开花结果,长成参天大树。

丝绸与书籍的关系,有点类似于米粒和稻种。假如中国出产的大米成千上万吨地运往西方,一时或许会掀起“中国米”热,但当大米被消费完之后,其影响也就随之烟消云散,因为米粒无法再生米粒,假如中国出产的稻种,只要有一颗掉入东方的土壤,如果有人去呵护,便会生根发芽,便会抽出稻穗,便会形成稻田,继而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,因为稻种具有再生自我的机能。

书籍也如稻种,一旦播撒在人之心田,就会生根发芽,继而开花结果,在精神世界营造出一片绿洲,直接影响人们创造文明的活动。近代以前,中日之间人员往来及物资流通受到自然条件的阻遏,但日本却最大限度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倘若隋唐以来,日本不是冒鲸波之险孜孜求索书籍,而是大量购买丝绸、陶瓷、漆器之类,那么,最多也只是“优孟衣裳”而已。

笔者在探索中国典籍东传史的过程中,还发现了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:清代以前日本人来华求书,往往每种只取一本,很少有带复本回国的。仔细想来,路途凶险,跨海不易,为了多带书籍,求阙本、购新书乃是效率最高的方法。

众所周知,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人和书。日本由于自然环境限制,自古无法像新罗那样把大量学生送入太学(日本人入太学者,仅阿倍仲麻吕一人),而且中国士大夫渡海传授者罕见其人(少数僧侣除外),因此,通过书籍汲取大陆文化,遂为不得已之策。然而,事实证明,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,比之人持续时间更长,涵盖空间更广。

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,那么,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,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,可以超越时空,惠及后代。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经过传抄、翻刻而流布世间,再经阐释、翻译而深入人心,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。

① 指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集。

时下讨论日本文化的特点,强调其独创性者有之,突出其模仿性者亦有之。然而,从“书籍之路”的角度审视之,日本文化的创造模式往往介乎两者之间。比如假名文字,均从汉字的草书及略笔蜕化而来,多少留下模仿的痕迹;但是,假名并非为了描摹汉字、标记汉语而创制,只是借助汉字的部分形体以表述日本人的思维,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创意。再如汉诗,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吟咏了大量作品,清末俞樾所编《东瀛诗选》录诗4800首,这仅限于17世纪以后佳作(偶含古代作品),其总数之巨实无法估算,而这些数以万计的诗歌,只是借用汉诗的形式以歌咏日本人的心声,也不能说是纯粹的模仿。

明治维新(1868)之前,“四书五经”之类是日本公私学塾的启蒙书籍。虽然大多数日本人不通汉语,但却可以读懂汉文书籍。他们通过阅读中国典籍,与中国人接受大致相近的熏陶,由此形成类似的道德观念、审美意识、行为规范、艺术情趣。他们的知识构造与心灵世界,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。那么,由心灵的发露而创造的文化,自然也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。

书籍本身是一种奇特的生命体,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繁衍子孙,构成大小不等的血缘家族。17世纪前期,清人商舶把《水浒传》带入日本,引起彼地知识阶层的关注,很快有人编出《水浒传解》、《水浒传抄译》、《水浒传译解》等,对小说进行注释和编译;18世纪《通俗忠义水浒传》、《水浒传画本》、《水浒画潜览》等全译本、图解本相继问世,在庶民中形成“水浒热”;与此同时,日本作家受此启发,创作了《本朝水浒传》、《日本水浒传》、《女水浒传》、《天明水浒传》、《天保水浒传》、《倾城水浒传》等几十种类本。这些类本不同于译本,虽然大多借用“水浒”题名和某些故事框架,但登场人物、时代背景、表演舞台、故事细节都是日本的,既不是中国文学的模仿,也难算日本文学的独创,笔者将这些书籍看作是中日文学混血的后代。

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甚少,为何文明景观极为相似?这个谜底现在可以揭开:中国典籍犹如文明的种子,经由“书籍之路”播撒到日本列岛,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,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,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王勇. 玄奘に教わつた入唐僧たち[A]. [日]なら・シルクロード博記念国際交流財団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. 三法法師・玄奘のシルクロード: その遺産と指針[C]. 奈良・なら・シルクロード博覧会記念国際交流財団, 2000. 13-19.
- [2] 钟叔河. 周作人文类编·日本管窥[M]. 湘潭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1998. 27-36.
- [3] 王勇. 中西进.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: 人物卷[M].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1996.
- [4] 彭定求, 沈三曾, 杨中纳, 等. 全唐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6.
- [5] 沈福伟. 中西文化交流史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8.
- [6] 刘昉. 旧唐书·倭国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5.
- [7] 王溥. 唐会要·倭国 卷九九[M]. 台北: 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(第607册), 1986.
- [8] 陈寿. 三国志·魏志三·倭人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5.
- [9] [日] 池田温. 古代を考える 唐と日本[M]. 東京: 吉川弘文館, 1992.
- [10] [日] 田中健夫. 善部国寶記·新訂善部国寶記[M]. 東京: 集英社, 1995.
- [11] 杜佑. 通典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2.
- [12] 王勇. 中日关系史考[M]. 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1995.
- [13] 王勇. 唐历在东亚的传播[J]. 台湾大学大历史学报, 2002, 12(30) 33-51.
- [14] 叶辉, 邢贞兆.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曾有一条“书籍之路”[N]. 光明日报, 1999-08-10(2).

The “ Silk Road ” and the “ Book Road ”

——A Unique Pattern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

WANG Yong

(*Institute of Japanese Culture Studies , Zhejiang University , Hangzhou 310028 , China*)

Abstract : The “ Silk Road ” was originally put forward by westerners to term the trade rout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, which cannot be applied without restraint to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other areas in the world . Research done from an Oriental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ancient East Asia , particularl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, has led to the discovery that the said cultural exchang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“ Silk Road ” in terms of their content , form ,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; thus the concept of the “ Book Road ” is advocated . While silk symbolizes Chinese material civilization , books featur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deology . Generally , the former is lacking in self-reproductive capacity , whereas the latter may have an impact on human minds regardless of time and space , bringing benefits to the later generations . It is because Japanese Kenzuishi and Kentoshi were commissioned to purchase books that Japan inherited a lot of Chinese culture , although there was not much travel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.

In the nearly-290-year Tang Dynasty , 50-odd countries dispatched diplomatic corps to China . The Tang Dynasty got in touch with northern nations , western nations and southern nations mainly for the purpose of war , marriage , trade and the like . However , contact with eastern nations , which includes communication frequently by books , was rather distinctive . In *Jiu Tang Shu* (*Old History of Tang*) , it is mentioned that Japanese Kentoshi spent all their rewards given in the Tang Dynasty on books ,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ase of trader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, who came to China for silk .

There is no denying the fact that Japanese students and monks in China in the company of Kentoshi were stars on the “ Book Road ” . For example , Genbo once brought some 5 000 Buddhist scriptures back to Japan ; Saichao , Kukai , and Ennin also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in China whose catalogue has still remained . In addition , books were also taken to Japan as a private present , by merchant ship , via Sillans (ancient Koreans) , or through Chinese visitors .

Nihonkoku-kenzaisyo-mokuroku compiled in the late 9th century comprises 17 345 volumes of various types , which almost amount to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entir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the Tang Dynasty . It is actually the surviving catalogue compiled after Japanese Royal Library caught fire . It is thus evident that a surprisingly huge number of books were carried from China to Japan in the Tang Dynasty .

Chinese books , which are in circulation in Japan by way of duplication , reprinting , annotation , translation , or quotation ,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piritual food for Japanese intellectuals , produc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in various periods .

Key words : the history of Sino-Japan relation ; the Cultural Circle of East Asia ; Kentoshi ;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